



虎丘山寺始建年代考

◎ 孙中旺

苏州城西北的虎丘山，风景优美，文化沉淀丰厚，享有“吴中第一名胜”“江左丘壑之表”等美誉。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葬其父阖闾于此，葬后三日，有白虎踞于上，故名虎丘山。建于其上的虎丘山寺（即云岩寺）历史悠久，东晋以来名僧辈出，尤其是北宋末年驻锡于此的绍隆禅师，大振圆悟禅风，遂成一派，即虎丘派，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并曾盛行于日本。但该寺的始建年代在唐宋以来的方志中均记载有误，并沿续至今。本文勾稽相关史料，拟对此作一简单考证。

一、唐宋以来方志记载中的虎丘山寺始建年代

在唐宋以来的方志中均明确记载虎丘山寺原为东晋名相王导之孙王珣、王珉兄弟故宅，在咸和二年（327年），舍宅为寺，择其要者，摘引如下：

唐陆广微《吴地记》：

其山本晋司徒王珣与弟司空王珉之别墅，咸和二年，舍山宅为东西二寺，立祠于山。

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中《寺院》：

云岩寺，在长洲西北九里虎丘山，即晋东亭献穆公王珣及其弟珉之宅，咸和二年，舍建精庐于剑池，分为东西二寺。

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三十二《郭外寺》：

云岩寺，即虎丘山寺，晋司徒王珣及其弟司空王珉之别业也。咸和二年，舍以为寺，即剑池而分东西，今合为一。

明代林世远、王鏊等《姑苏志》卷二十九《寺观》：虎丘禅寺，在虎丘山，晋王珣及其弟珉别业也。咸和二年舍建，即剑池分为东西二寺，今合为一。

清代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卷四十二《寺观》：云岩禅寺，在郭外虎邱，晋司徒王珣及其弟珉之别业，咸和二年舍建。

另外崇祯、乾隆及民国诸版《吴县志》《百城烟水》《姑苏采风类记》《吴都法乘》《吴门补乘》《虎丘山志》《虎阜志》《桐桥倚棹录》及《烬余录》等文献中也均认为虎丘山寺为咸和二年（327年）王珣及其弟王珉舍宅而建，兹不赘述。今人所著《苏州古典园林史》及《六朝江南园林》等著作也沿用此说，可见流传之广，几为不易之论。但检诸史籍，却发现此说大有问题。

二、王珣、王珉舍宅为虎丘山寺年代考

要考察王珣及其弟王珉舍宅为寺的时间，先应从王氏兄弟的生平入手。王氏兄弟均为当时名士兼名宦，史料记载颇多，其生平大体情况不难蠡测。检《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附王珣传》载，王珣于隆安四年（400年），“以疾解职。岁余，卒，时年五十二。”《晋书》卷十《安帝纪》也载隆安四年（400年），“五月丙寅，散骑常侍、卫将军、东亭侯王珣卒。”可见王珣卒于隆安四年（400年）五月，终年五十二岁，可推得其生年在永和五年（349年）。《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附王珉传》载王珉“太元十三年（388年）卒，时年三十八”，可推得王珉生于永和七年（351年）。由此可见，咸和二年（327年）王珣和王珉兄弟均未出生，故不可能在该年舍宅为寺，此说谬误无疑。

上述诸书均认为虎丘山寺为王珣兄弟舍宅而成，那么应该发生在二人同时存世之年，即永和七年（351）至太元十三年（388年）间，具体年代有待于继续考证，而《晋书》卷九十四《隐逸·戴逵传》中的一则史料给我们提供了线索。该传载戴逵，“孝武帝时，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累征，辞父疾不就。郡县敦逼不已，乃逃于吴。吴国内史王珣有别馆在武丘山，逵潜诣之，与珣游处积旬。会稽内史谢玄虑逵远遁不反，乃上疏曰……”此则史料说明在戴逵逃吴之时，武丘山（即虎丘山，唐代避李虎讳，改“虎”为“武”。）尚为王珣“别馆”，王珣并在此接待戴逵，“游处积旬”，由此可见当时还未舍宅为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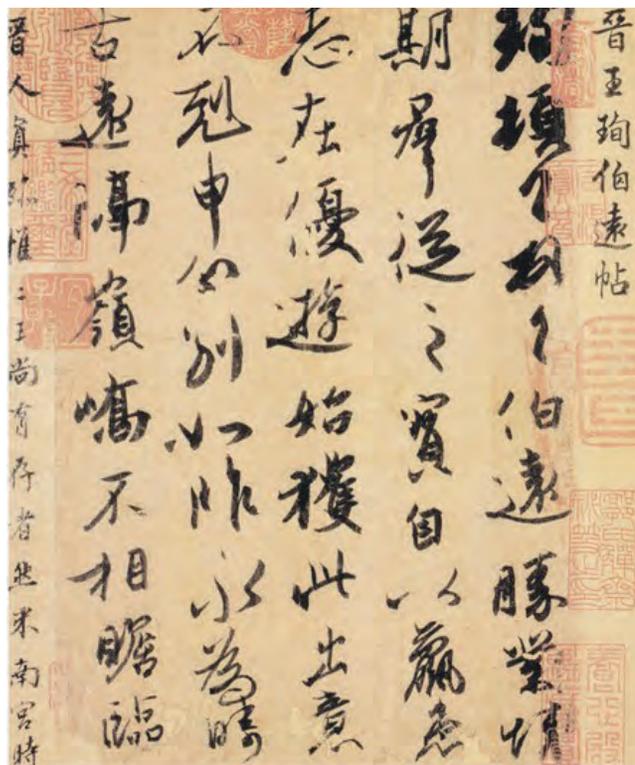
此则史料仅记载戴逵逃吴发生在晋孝武帝年间，即宁康元年（373年）至太元二十一年（396年）间。但从其它史料中可以发现此事发生的具体年代，《资治通鉴》卷一百七《晋纪二十九》载，太元十二年（387年）夏，“诏征会稽处士戴逵，逵累辞不就；郡县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吴。”《晋书》卷九《孝武帝纪》载太元十二年（387年），“六月癸卯，束帛聘处士戴逵、龚玄之。”可见东晋政府征聘戴逵是在太元十二年（387年）六月，那么戴逵逃吴即应发生在此时或稍后。上引《资治通鉴》该卷中也记载谢玄于此年正月被任命为会稽内史，与上述史料契合无间。

综上所述，王珣、王珉舍宅为虎丘山寺应发生在太元十二年（387年）六月至太元十三年（388年）间，即戴逵游览之后、王珉去世之前。

三、其它相关问题的探讨

作为侨姓士族的王珣兄弟因何会在吴郡虎丘有宅，又因何舍宅为寺，虎丘山寺的开山僧人是谁，亦可进一步探讨。

王珣出身于门第显赫的琅琊王氏家族，东晋南朝时期为首屈一指的侨姓门阀士族，王珣祖父王导，为东晋朝廷的建立和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谓。当时吴郡为经济文化发达的三吴地区之首邑，故吴郡太守（吴国内史）为权高



位显之职，非声望资历较高者不能担任，而琅琊王氏家族子弟因其门第清显，担任该职的比比皆是，王珣之父王洽及叔父王悦、王劭、王荟等人均曾为吴国内史。他们在任时大都关注民生，政绩颇显，如王洽就曾因吴郡“虫鼠为害，瓜麦荡尽，编户僵死，葬埋无主，阖门饿馁，烟火不举”的惨状而上表朝廷。王荟担任吴国内史时，吴郡“年饥粟贵，人多饿死”，王荟就以“私米作饘粥，以饴饿者”，救活了很多饥民。由于上述原因，琅琊王氏在吴郡声誉颇著，其家族中也有不少子弟居于吴郡，如王珣堂兄弟王廞就曾“以母丧，居于吴”，后来王廞之子王华也在吴郡居住多年。隆安元年（397年），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王恭在京口起兵讨伐王国宝时，想借助王氏在吴郡一带的影响力，还曾假王廞为建武将军、吴国内史，“令起军，助为声援”。桓玄覆灭后，有人欲反叛，引诱王珣另一堂兄弟王谧“还吴，起兵为乱”，从中可见王氏在吴郡的影响之大。

王珣在太元十年（385年）八月谢安卒后迁侍中，不久转辅国将军、吴国内史，直到太元十五年（390年）九月升任尚书仆射，在吴郡为官多年，史载其“在郡为士庶所悦”。当时吴郡名士张玄为冠军将军、吴兴太守，两人交往频繁，《世说新语·政事第三》载：“王东亭（王珣）与张冠军（张玄）善，王既作吴郡，人问小令（王珣）曰：‘东亭作郡，风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与张祖希（张玄）情好日隆耳。’”由此可见王珣“在郡为士庶所悦”的记载不虚。当时的虎丘山已为吴中名胜，据《艺文类聚》卷八《山部下·虎丘山》载，与王珣同时代的著名画家顾恺之有《虎丘山序》曰：“吴城西北，有虎丘山者，含真藏古，体虚穷玄，隐嶙陵堆之中，望形不出常阜，至乃岩岬，绝於华峰。”可见虎丘山风景之优美，因此王珣选择此山建“别馆”亦为情理之中。《艺文类聚》卷八《山部下·虎丘山》还记载王珣撰有《虎丘山铭》和《虎丘记》，可见其对虎丘山着意甚多。

除了虎丘山有“别馆”外，王珣在吴郡城内也有宅院，如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园第》就记载“晋东亭献穆公王珣与其弟珣宅，外在虎丘，内在白华里，后皆施以为寺，昔虎丘东西二寺、今之景德寺，皆是也。”可见其在城内白华里也有住宅，后来也舍为景德寺。

东晋时期佛教渐趋昌衍，名士与名僧之间来往频繁，不少名士都有舍宅为寺之举，单以吴郡而论，就有当时担任太尉之职的吴郡人陆玩舍宅为灵岩山寺、晋穆帝皇后何氏之父何准舍宅为般若台等。王珣与王珣兄弟对佛教服膺颇深，和名僧交往记载颇多，如《高僧传》卷一《译经上·晋庐山僧伽提婆》载，“时卫军东亭侯琅琊王珣，渊懿有深信，荷持正法，建立精舍，广招学众。提婆既至，珣即延请，仍于其舍讲《阿毗昙》，名僧毕集。”可见当时王珣对建精舍、兴法会之热衷。该书还记载王珣与其父王洽对当时建康瓦官寺名僧竺法汰“钦敬无极”。《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附王珣传》也记载名僧提婆在为王珣兄弟讲《毗昙经》时，“珣时尚幼，讲未半，便云已解，即于别室与沙门法纲等数人自讲。”可见王珣也具有相当深厚的佛学造诣，王氏父子兄弟对佛教的服膺，是其舍宅为寺的思想基础。

王珣兄弟舍宅为虎丘山寺，应与当时名僧竺道壹有密切关系。据《高僧传》卷五《义解二·晋吴虎丘东山寺竺道壹》记载，竺道壹俗姓陆，为吴人，疑出自吴郡大族陆氏，“少出家，贞正有学业，而晦迹隐智，人莫能知，与之久处，方悟其神出，琅琊王珣兄弟深加敬事。”王珣在其所著的《游严陵濑诗叙》中还记载：“道壹姓竺氏，名德。”可见其对竺道壹的推崇。竺道壹曾在建康瓦官

寺跟从与王氏家族交往颇多的竺法汰受学，“数年之中，思彻渊深，讲倾都邑”，与竺法汰另一高足昙一齐名，“名德相继，为时论所宗，晋简文皇帝深所知重。”在其师竺法汰于太元十二年（387年）死后，竺道壹东还吴郡，“止虎丘山”。王珣兄弟大概就是在此时舍其虎丘山别馆给竺道壹为寺院，竺道壹在此“闲居幽阜，晦影穷谷”。王珣叔父王荟为会稽内史时，“于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风德高远，请居僧首。”竺道壹应邀主持嘉祥寺后，声名益著，“四远僧尼，咸依附咨禀，时人号曰九州都维那。”从嘉祥寺回来后，竺道壹继续驻锡虎丘山，“以晋隆安（397~401年）中遇疾而卒，即葬于山南。”竺道壹可以说是虎丘山寺的开山名僧。

据乾隆《苏州府志》卷二十二《坛庙二》载：“东山庙在虎邱山门内东，祀晋司徒王珣，珣与弟司空珣舍别业为寺，故寺中立祠祀之。又立西山庙于西，以祀珣。珣庙又称短簿祠，今居民皆祀为土神。”为其分别立祠祭祀，并奉为土神，这也是苏州人对王珣兄弟舍宅为寺义举的永久纪念。

定閱公沈書尚傳宮

